

鍾逸傑，〈初來乍到〉

陶傑譯，《石點頭——鍾逸傑回憶錄》（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

1. 現今的政治風氣，社會氣氛，跟 50 年代相比，大不相同。怎樣看這個變化呢？什麼促使這些變化？
2. 作者說，香港在 50 年代「開始尋找戰後自己的身份，……香港把殖民地身份擱在一旁，形成了責任感並自力更生」（頁 13），今天，香港擺脫了殖民地身份，香港人找到自己的身份嗎？
3. 有論者說：鍾逸傑，這位來自英國的西方白人，前香港殖民地政府布政司、署理港督，比大多數人都更有資格說一句：「我是香港人。」你怎樣看自己的身份？

鍾逸傑《石點頭——鍾逸傑回憶錄》

陶傑譯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4年

第 1 章

初來乍到

一九五七年夏一個酷熱的清晨，我和妻子帶著剛出世的兒子到了香港。從英國出發飛了三天，飛機最終輕輕掠過九龍的山坡，迅速突降，衝過在與跑道平衡交錯的道路上停下來讓飛機先降落的車輛。我們坐小輪過海，第一次見到陡峭的山脊、連綿的群山和碧綠的海水，還有灰濛濛的城市建築。戰後的香港掙扎了十二年，才適應了命運的安排——一百年前由英國割佔後，從此孤懸於華南的涯岸之外。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大改變了中國政治經濟的面貌，也對香港影響深遠。雖然香港是僅存的十九世紀條約通商口岸，經此卻不再可以進入中國。事實上中國對香港是封閉的，對全世界也如此。戰後的香港，人口從五十萬劇增至二百萬，超過一半的人住的是一種設計奇特的屋子——一種鐵皮屋頂的木屋，依山而建，散亂地藏在溪流旁的樹叢中。

我們的住所位於半山，遠眺可見我上班的那陰沉而毫不顯眼的工商署大樓，混處於

海傍眾多辦公大樓之間。我們住在海傍和山頂矚目的高尚住宅之間的地段，雖然薪水不高，卻也讀得起兩個穿白褂黑褲的女傭。每天都有不同的商船周旋於港口的鎖鑰與舢板之間，還有汽船和駁艇在各色船隻間穿梭而行，而來自中國的帆船在一片繁忙中淡然而過，取道資本主義香港這條捷徑，再轉北航向共產主義治下的汕頭。港口遠處是九龍灰暗的民居，其後是重巒疊嶂，沒入中國的蒼茫。

雖然香港從中國手裏得到大量廉價蔬菜、豬肉及其他供給，但還得作好最壞打算，準備中方斷供圍困。我負責的是確保香港有足供幾個月用的糧食、煮食用木柴儲備，以及供應人體必需養份的大豆和鹹牛肉。我還必須控制和不讓共產黨染指戰略性化學品，這些化學品主要供鐵皮屋工廠用來製造搪瓷壺和鍋子，以及銷往第三世界國家的那些煤氣燈上的塗層燈罩。我學會了怎樣在全球市場上買大豆，了解到過期罐頭牛肉的危險，怎樣買賣成捆的婆羅洲紅木柴枝——在罐裝煤氣問世之前，香港的雜貨店賣給廚房煮食用的，就是這種剝好的木柴。

大米的交易是潮州人的天下。潮州人佔香港的五分之一人口，社群內部團結一致。他們來自福建和華南廣東接壤的地區，由於歷代以來不斷向外遷移，泰國的米商也來自

潮州。潮州方言鼻音粗重，他們一用方言交談則恍如自成世界，其他的中國人不易聽得明白。香港的大米多由這些商人進口，拍賣會無聲進行，只有賣家才能看見買家的叫價，買家只是在拍賣者的算盤上移動一兩顆小珠子。沒人說話，只是點點頭，交易就成了。大米買賣是一架環環相扣的連鎖列車，每一個環節都好像有賴於另一方：農民有賴出口商，入口商有賴出口商，批發商有賴入口商，零售商有賴批發商，而家庭主婦則有賴商店店主。沿著這條連鎖線，過不了幾天或者幾個星期，錢就從廚房流到了稻田。這簡單的買賣過程背後，是社會、道德、經濟各種關係的活動，一切都要保持平衡：這些關係從香港擁擠的街道一直延通到泰國稻田的農民裏。

最初兩年我在香港和商人、店家以及日用品、工業原料打交道，這為接下來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香港蠢蠢欲動，開始尋找戰後自己的身份，下議院和英國政府則放任無為。香港把殖民地身份擱在一旁，形成了責任感並自力更生，還意識到要開始興建房屋來安頓中國內戰後抵港的上百萬人口，擺脫混亂，建立秩序。這裏的人比戰前更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該擁有甚麼權利，英國戰後重新評估大英帝國的角色和殖民地的地位，但香港不在評估

之列。香港一時還憧憬建立更具代表性的自治政府，但大陸移民如潮湧至，香港就此謹慎地走向一九九七年那個終極日子。

政治現實決定了這種慢兩拍的步伐。香港不像其他殖民地，並沒有因為急於獨立而匆忙開展選舉。香港人知道，佔殖民地大部分面積的新界在租約期滿後的大局一日未定，未來的日子還將繼續變化無常。香港有充裕的時間發展社會和經濟，建立一個活力充沛的大都會，成為世界的一大奇蹟。「爆炸的人口」——幾百萬來香港避難的人帶來了機器、資金和技術，在搖搖欲墜的棚屋之間開展工業。政府相應建起了外表簡陋灰暗的徙置區，一家人一個房間，共用房子之間的公用廚房和廁所。孩子們倒異常穿戴整潔，揹著書包，吃力地爬樓梯到天台學校上課。兜售各種家庭用品的小販，填滿了各幢房子之間的空隙。徙置區的房租很低，從中國進口的食物又多又便宜，只是謀生不易。這些家庭在狹窄的小屋一住經年，從無抱怨，只想為自己和子女擺脫貧困而拼搏下去。

香港文化生活的嫩芽開始紮根。中英協會^(註一)員有中國籍、英國籍、葡萄牙籍的

(註一) 原名 Ho Shobee Club，為香港殖民地時代上層行政文化人士的聯誼組織。

學術或專業人員，其中一位儒雅的傑出詩人布蘭登^(註二)，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我是中英協會的秘書，這個協會大力促成新大會堂的建成。自從世紀初匯豐銀行佔用了廊柱森然的舊大會堂，香港就欠缺了這樣的一個文化場地。中英協會也主力創辦了香港管弦樂團，並草創了第一屆藝術節，在新完工的天星碼頭舉行。一經覓得能演奏中國樂器的樂手，就我所知，首個公開中樂音樂會就在一九五八年假西洋會所富麗的大堂舉行。現在，中樂團和中國樂器演奏的悠揚樂韻，已處處可聞了。

維多利亞市區位於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之間不僅是一水之隔。九龍是一個很不同的地方，另一個天地，是前往哥爾夫球場的必經之地。沒有甚麼必要冒險涉足九龍，因為一切舒適生活所需都在港島。而且，到九龍去無論如何都得坐渡輪，累人得很。香港身為國際城市，十九世紀以來，商業和專業活動都集中在港島，甚至直到今天，雖然有了三條過海隧道連接兩端，許多住在港島的人對九龍仍然知之甚少。很快我們就收拾細軟坐渡輪到了這另一邊的世界，自一九五九年，我們大半輩子都在這片當時尚是香港鄉郊的地區工作。

(註二) 布蘭登 (Randall Blunden, 1896-1974)，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軍人詩人，一九五三年來香港任教香港大學英文系，六十年代初歸國。

李歐梵，〈香港是國際大都市嗎？〉

李歐梵，《又一城狂想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1. 你認為一個國際大城市應具備甚麼條件？你同意作者所引述的那四項嗎？〔頁90-91〕
2. 香港人一向以所居地為國際大城市而自傲，但作者卻不如此想，你認為他的觀點過激嗎？

香港是國際大都市嗎？

漢納茲提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四大條件，前提是超越國界，也就是凌駕於國家主權和政府之上。以這四大條件為基準推之，香港至少符合了第一項（金融中心）；正在積極推動第四項（遊客）；然而在第二項（外來人）和第三項（文化）有待改進。

瑞典人類學家漢納茲（Ulrich Hannerz）在一本關於全球化的著作《跨國的聯繫：文化、人民、地方》（*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中，提出一個「國際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觀點，也為現今世界各大都市的「國際化」奠定一個理論基礎。我曾多次引用，最近一次是在港大舉辦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中。

漢納茲在該書第十一章中提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四大條件，這些條件的前提是「超越國界」，也就是凌駕於國家主權和政府之上。這四大條件是：

- （一）國際大都市必須是跨國公司集中地和國際金融中心。
 - （二）它也是各第三世界居民的集中地。這當然是針對第一世界的大都市而言，譬如洛杉磯是墨西哥以外最大的墨西哥人城市，但也是韓國人、越南人和菲律賓人聚居最多的城市。
- 第三項是文化，指的特別是創意工業的人才。此處漢納茲所用的字眼不是「創意工業」（creative industries），而是「創意

活動」（expressive activities），也就是各種藝術上的表現，諸如繪畫、時裝、設計、攝影、電影、寫作、音樂、藝術等等。

第四項才是遊客。但此處所謂的遊客不僅是以旅遊團或由行方式來玩幾天的普通遊客，而更是一類「跨國精英」，可以同時在兩三個大都市輪流居住而習以為常的人，漢納茲稱之為home plus，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國際人士」。

以這四大條件為基準推之，香港至少符合了第一項（金融中心）；正在積極推動第四項（遊客），然而在第二和第三項方面有待改進。

第二項所指的「第三世界的居民」，在觀念上有待商榷：是否第三世界就出不了國際大都市？而以前屬於第三世界的亞洲城市——如印度的孟買、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當然還有漢城、新加坡、北京和上海，現在又作何解？

我可以斗膽為漢內茲的學說修正一番：我認為原來的第三世界城市反而要吸收更多第一世界城市的人來居住，當然也應該有更多的其他人種，如此才可以構成真正多元文化的基礎。

然而，我認為在華人佔大多數的城市（如新加坡和香港），雖然華洋雜處，但「混雜」的機會和空間並不多。我在七十年代初來香港時，本以為這個殖民城市洋味太重而華文化不足，但現在的觀察卻適得其反：香港的「土味」越來越重，「洋味」卻減少，即以語文為例，所謂「兩文三語」的說法，是一種理想，但現在依然是廣東話為「母語」，港人中普通話和英

語俱佳的還是不夠多，兩文書寫出類拔萃的更是絕無僅有。

除此之外，香港大部分的華人對於居住於此的其他族類的文化大多不聞不問，也沒有多大興趣（又有多少港人鍾意菲律賓的歷史和泰國的佛教，或印度的多元神話？）在文化修養方面，最多也不過偶爾去聽一場古典音樂會，捧捧台上演奏的明星——也是以華裔為主，如馬友友、郎朗和李雲迪——或吃吃西餐、嚐嚐韓國燒烤或泰國菜，一飽口福。

令我驚奇的是，香港年輕人似乎待喜日本菜，但對日本文化的興趣（除了漫畫外）並不大。這一個越來越「鄉土」的趨勢，在回歸後更變本加厲，如此則如何可以成為亞洲的國際大都市？不如稱之為中國的「國際特區」算了。

我看不久的將來，當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連繫更密切的時候，這個新特區將會成為事實，甚至可以成為中國的「超級大都市」！然而前提依然是民族國家，和漢納茲的基本觀點並不符合。

也正是這個同樣的四大條件，令中國各大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不合「國際」的資格，這是一個悖論。上海和北京的外國居民現在越來越多，但是否更國際化？英文書刊和報紙是否可以暢通無阻？在互聯網上是否不受拘束？

漢納茲所提到的第三項也是目前香港政府（除了旅遊外）最熱衷的一項，這不得不感謝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多年的倡導和努力。

然而我又覺得「創意工業」的先決條件是人才和「活動」的空間，所以漢納茲故意不用「創意工業」一詞，否則有創意的人才就會被「工業」和「生意」所淹沒或取代。不錯，「創意」也可以賺錢，但以賺錢為目的，「創意」則不一定會真正開創更多更好的文化空間。人才有待培養和孕育，除了金錢之外，還有其他無形的因素。目前香港政府對於文化只是從資助和管理入手，卻缺乏導引和開創的能力。

當然，問題又不僅如此，事關香港「民間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界各「小眾」之間的凝聚力。照目前的模式，我看長此以往，香港可能會人才外流，反而促進深圳、廣州和上海的「創意」文化。所以我一向認為：香港不乏人才，也不乏創意，但在地產和金融業掛帥之下，對於文化和創意活動缺乏深厚的了解，也沒有足夠的空間。

漢納茲在此書的第三部分，舉出三個都市作為例子——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和南非約翰尼斯堡的——一個郊區——蘇菲亞城，只不知這三個城市是否也有值得香港借鑑的地方」。

阿三，〈身在葵青，或不是葵青〔節錄〕〉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編：《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6）。

1. 可以和同學深入介紹一下你生活的社區嗎？
2. 你對自己生活的社區有感情嗎？(Sense of belonging)
3. 作者在文中提到：“落地生根長相廝守一起白頭終老已經不合時宜。”（頁75）你對此說有何看法？
4. 「人與土地的關係根本薄弱，哪裡能生活〔生存〕，哪裡便是家。」〔頁75〕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前途、生活？香港是你的家？你可有想過往外國闖一番？

身在葵青，或不是葵青

阿三

我們一直居住在這裏，卻沒有意識到社區的命名，也沒習慣把人與地方的關係拿來分享。他們的生活一直如此，倚山而建的公共屋邨靠斜坡上的樓梯與走道連接，遠看的走道如石化了的瀑布；鄰近的工廠大廈與貨櫃碼頭，或許是他們謀生的場所，賺錢養家的地方；從前這裏沒有太多的運動場與劇院，後來人們說，住在這裏的人需要文娛設施，就植樹般一棵一棵的樹立。他們就是如此生活，社區一直擴張，不論有否在地的書寫與討論、歷史的翻查與考證，或形形色色的文化活動。

我不知道亦不確定社區在香港當下的意義。社會是否發展到某一個程度，人們自然會從求存迫切、追求物質、安定嚮往與繁榮發展的心態，轉向至以人為本的情感與價值尋溯？還是因為香港回歸之後，從殖民地時代進入再殖民的階段，文化衝擊此起彼落，自開埠以來從未平

息；並恰巧經歷八、九十年代經濟繁榮的風光之後，我們不得不承認紙醉金迷的不復再，因而重新思索生而為人的意義？我只能肯定，香港各區愈來愈多以藝術為名的計劃，大大小小在商場或公園舉行的文化活動，頌揚不能以數字換算也與經濟無關的價值，述說另一版本的故事；惟人們對社區及人與地方的關係，似乎仍朦朧難辨，浮游於泛泛之談的層面。

誠然，社區（community）概念涵蓋範圍不小，界定方法多樣，要討論的話好像甚麼都能說，但說來說去卻無法準確申述。共同經驗（common experience）與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是較常聽見的說法，但甚麼是我們共同的經歷，而歸屬感何以凝聚呢？「葵青」一詞，是政府行政區域的地理概念。十九世紀末，葵青已屬臺灣管轄，直至一九八五年才分割出來。望詞見義，「葵青」即包括葵涌及青衣，東至和宜合道，南至荔景山道，西至德士古道和馬灣海峽，北至城門道。然而，這種規定只屬官方版本，便利於行政管理與資源調配。葵青的範圍其實含糊不定，眾說紛紜，如葵青南鄉近美孚，曾有人區議將之撥入九龍區。而在一般市民的印象中，界線只是約略的感覺，尤其談到邊陲周邊的地方，是臺灣還是荔枝角，其實一點也不重要。範圍不能一刀切，居住或工作於此，我們又不一定知道彼此的生活習慣與規律，而每一個人的節奏亦不盡相同。近城門隧道出口的梨木樹邨或葵山的安蔭邨，與地鐵站旁的葵盛東邨與葵興邨是兩種密集的情境；山坡上開闢的荔景邨與相鄰邨拾級而建的格局，又架構出別樹

一格的空間運用方式。跨過了藍巴勒海峽（即青衣與葵涌之間的海峽），青衣島嶼自成一角，光看青衣機鐵站、集車站、商場、交通交匯處與住宅一身，而島之西及南邊則人跡罕至；再者，我們尚未考慮鄰近金山郊野公園的華景山莊與海峰花園等高尚住宅區。葵青，就是包羅萬象，就是各部分個性鮮明又共冶一爐的複合體。誠如黃燦然〈貨櫃碼頭〉一詩，「羅列一百四十四種被運送的貨物，說世界著名的超級貨櫃碼頭『像一個龐大的封閉式難民營』，彷彿又適用於形容葵青區吸納不同地方的人前來謀生的特性。那麼，我們不得不反問，所謂的共同經驗的同質性（Homogeneity），到底是甚麼？」

人與人的關係，建基於不同的劃界，以辨別自身與他人的差異。我與他／她、我們與他／她們，因應不同的情況，按照不同的界線，永無休止地分組，及重新分組。年齡、性別、階級或種族，甚至在葵青居住或工作多久、廣東話有多偏差或「純正」，或是來此消遣購物、家庭聚首、夾公仔排戲，還是參與運動競賽和其他目的，全都是實際差異的體現。整體（Entity）與殊異（Distinctiveness）、個體（Individual）與族羣（Groupness）的區分因而形成，亦是構成社區的主要方法。如果，我們認同一個羣體，感覺自己屬於這個羣體，是基於個人與羣體之間存在共

1 黃燦然：〈貨櫃碼頭〉，《我的靈魂詩選一九九四—二〇〇五》（香港：天地圖書，二〇〇九年），頁二三三—二三六。

同的議題、需要、期望或理念，並於此結盟關係中祈求安逸與穩定。不過，落地生根長相厮守一起白頭終老已經不合時宜。社會制度的確立是客觀環境使然，而個人感覺與情緒投向則相對主觀，我們不能把兩種因素混為一談，儘管雙方互為影響。恆久一起生活於同一地方，漸漸建立互相依存的情感關係，是社區組成的一種；因契約、營商、工作等人為因素而聚集在一起的結盟（Association），屬另一種的聚集關係。

工業急速發展與城市膨脹，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調子。大環境的轉變，間接瓦解基於血緣或種族的緊密社區關係。交通便利了，人們每天四處奔走，人與土地的關係根本薄弱，哪裏能生活（生存），哪裏便是家。套入香港本是移民城市的歷史脈絡，及由大家庭轉型為核心家庭的現況，我們或許更能捕捉葵青區內各公共與私人樓宇的情況。葵青本是西區走廊的大動脈，這彷彿是現代文明人口高速流動的明確不過的暗喻。正對荔景住宅區的青葵公路、荃灣路與葵涌道，是電台交通消息每天報道的名詞；青山公路葵涌段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前連接九龍與荃灣的要道，一九七四年通車的青衣大橋則是另一項重要基建。地鐵、西鐵、東涌線與機場快線又貫穿該區，別忘記，葵青是接連大嶼山及機場的主要部分，三號幹線、九號幹線、青馬大橋、汀九橋及昂船洲大橋統統在這片細小的土地上。行人如流水，背山面海之間正是縱橫不絕的大小車輛。運輸用地我們鮮會進入，站在山邊高地，我們眺望每天如輾轉運轉的機械，與之共存又互不相干。怪不得陶俊以「神秘」為題，形容曾是船塢、監獄及傳為軍火倉庫的昂船洲，時至今日，昂船洲大橋開通了，我們最多只能乘車經過此地。

龍應台，〈玉蘭花〉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修訂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

1. 作者在文章開首提出「每一個大城市都像一件華美的大衣」。她究竟要藉此說明什麼問題？你是否同意？
2. 什麼是作者在文章內提到觀光手冊裏沒寫的香港一景？作者特意點出這香港特色，希望說明的是本地社會中的什麼問題？
3. 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是甚麼樣的社會制度，甚麼樣的歷史過程」，令讓人輕蔑的「垃圾婆」在困苦中生活的問題。你可以為作者以上問題提供一些說明嗎？
4. 作者在文章結束時提到「老媽媽，是應該簪着一朵乳白色的玉蘭花的」，這一假設性的描述，究竟想要說明什麼？

玉蘭花

龍應台

每一個大城市都像一件華美的大衣，大衣裏可能也都長滿了虱子。對一個過路的客人而言，他不太有機會翻開大衣，看見衣縫裏密密麻麻的虱子，但是，大衣扣不嚴整，裏頭露出不怎麼好看的破絮，卻是大城市的常態。在萬商雲集的紐約，到處可見眼睛紅腫全身酸臭的男人，褲襠的拉鍊壞了，骯髒的毛髮露出來，腳上踩着別人的鞋子，手裏拿着喝空了的酒瓶。在開擴大氣的莫斯科，每一個街角都有拽着長裙的吉普賽女人摟着睡着的孩子街頭乞討。孩子永遠是睡着的，使你懷疑他是否被餓了斃。在官氣十足的北京和燈火輝煌的上海，無家可歸的人用各種眼神看着你，逼你毫無退路地看見他的一無所有，也看見你和他之間險峻的階級對立。在台北，這個帶點文人的懶散氣質的城市，你得特別到夜市裏或地下道，才能看見幾個少了腿或胳膊的人坐在地上用頭撞地。

香港的「大衣」華麗得不尋常。中環的大樓有的雍容優雅，有的氣派恢弘。內

部裝潢講究設計的藝術美感，外部大樓和大樓之間的細節銜接，講究實用效率，整個城市基礎建設的完整和綿密，可能是世界第一。如果只看表面，台北跟香港比起來，像個初建城的鄉下村姑，剛剛學會抿着嘴擦口紅。

然而任何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環高樓與高樓所形成的深谷窄巷裏，都不會不看見她們：很瘦，很老，用那佈滿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着很重的東西，她們的背脊因為用力而彎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齡的人，做的卻是苦力的活，沉默地穿梭在高樓的陰影中。這是香港一景，只是觀光手冊裏沒寫。

做為過客時，不理解為甚麼外表如此高貴華麗的香港會有這一面，好像一個全身皮草、



珠光寶氣的人腳上穿着塑料拖鞋，露出腳指頭，指甲縫裏全黑；這些被人們輕蔑地稱為「垃圾婆」的老婦人，曾經為人妻，她們的丈夫在哪裏？曾經為人母，她們的子女在哪裏？是甚麼樣的社會制度、甚麼樣的歷史過程，使得她們在體力最弱、生命最末的階段裏，不能在家裏做慈祥的奶奶，卻在街頭做牛做馬掙一口最後的飯？

住到香港來了，我逐漸明白，「垃圾婆」處在一個甚麼樣的結構裏：

在香港，六十至六十九歲老人中，每十五位有一位要依靠政府的救濟金生存。七十至八十四歲的老人中，每五位有一位要靠救濟金生存。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每四個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在香港，八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每兩位就有一位活在貧窮線下。

數字不說明全部，但是它總在複雜的一團黑暗上打上一道光，我不再驚奇，為甚麼，在富裕的香港，每到冬天慈善機構發放救濟米時，會有上千的老人勾偻着背天還沒亮就來排隊；排上幾個小時之後又總有幾個老人家在擁擠的人群中暈倒，為了一袋五公斤的白米。我也不再驚訝有很多香港老人住在「籠屋」裏——一張床，鎖在一個竹籠裏，就是他一生的家當。我去看望一個八十歲的老人，他住的是比

「籠屋」闊氣的「板屋」，木板隔出的四公尺平方，沒有窗。公用廚房裏髒得可怖，進入「板屋」，空氣令人窒息；但是床以外的空間，竟然一落一落佈滿灰塵的全是古書：史記、後漢書、資治通鑑、全唐詩、蘇軾全集、韓昌黎全集。問他最喜歡誰的文章，老人低着頭說，「韓愈」，我同時聽見天花板上老鼠隆隆奔竄的聲音。

如果老，而且還是個女人呢？

在香港，從八十年代起，服務和金融業取代工業成為主要經濟命脈，以往穩定的勞工工作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臨時工替代，產生出大量的工時超長而工資超低的工作，集中在非技術和低增值的行業領域裏。在這類非技術的工作人口中，女性幾乎佔了百分之六十，而這些女性的工資卻只有同工作的男性員工的百分之五十三。臨時工除了工作時間長，還得不到法定的勞工保障。

在香港，七十七萬多個女性的主業是家務，只有九萬三千個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務的操勞，可以做一輩子，但是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也沒有社會福利，更沒有社會地位。

在香港，月薪低於五千元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月薪超過一萬元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女性。

巷子，因為樓高而顯得深不可測。老婦人的推車上堆着一大疊廢棄的壓扁了的厚紙箱，推着推着紙箱就散落下來攤了一地；她弓下身來一隻一隻撿。我也蹲下來幫着，然後我們合力將紙箱固定，用繩子綁緊。她又搖搖晃晃一跛一跛地推着車向前走。那是一個穿着黑色唐衫的老媽媽，腦後梳着髮髻。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漸行漸遠，想着，這樣的髮髻啊，老媽媽，是應該簪着一朵乳白色的玉蘭花的。

關品方〈銀髮產業潛藏巨大發展空間〉(節錄)

《灼見名家—品評四方》 2022 年 06 月 13 日

<https://www.master->

[insight.com/%E9%8A%80%E9%AB%AE%E7%94%A2%E6%A5%AD%E6%BD%9B%E8%97%8F%E5%B7%A8%E5%A4%A7%E7%99%BC%E5%B1%95%E7%A9%BA%E9%96%93/](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9%8A%80%E9%AB%AE%E7%94%A2%E6%A5%AD%E6%BD%9B%E8%97%8F%E5%B7%A8%E5%A4%A7%E7%99%BC%E5%B1%95%E7%A9%BA%E9%96%93/)

1. 「銀髮族消費上升有助國家開發新興產業市場。」你在多大程度同意此說法？試加以解釋。
2. 近年，香港同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試探討香港發展銀髮族消費相關產業的可行性。

關品方〈銀髮產業潛藏巨大發展空間〉

香港特區過去一直以來最關鍵的問題，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貫短視，沒有長遠規劃。政府力量在這方面長期失職失責，沒有大視野和大格局，最終影響了老人的生活素質，辜負了香港作為全球最長壽地區之一的美名。

古語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關鍵在最後一句。幼兒和老人都照顧好了，那就天下太平，治理天下，就好像掌握在手中運用自如。這是孟子的王道仁政的精髓，基本意思是要關心百姓的福利，為人民提供生活保障。

虐兒虐老頻生 政府漠不關心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不斷發生虐待幼兒和虐待老人的事件。「童樂居」事件爆出醜聞，令人髮指。香港保護兒童會院舍的虐兒案，共有 27 名職員被起訴，翻查 CCTV，發現起碼有 407 宗虐待兒童的實際案例。特區政府領導在這方面嚴重失誤，責無旁貸。照顧老人方面，問題同樣嚴重。公營私營安老和康復服務被長期忽略，亦不時爆出老人被虐待的醜聞。

照顧老人、支援殘疾人士及弱勢社群這些方面，隨便在街頭訪問香港市民，大都認為特區政府工作表現不合格。這不是對政府不滿，更不是挑撥離間。加上過去 3 年，由於修例風波引發的各種問題，一連串事件先後爆發，簡直驚濤駭浪，充分暴露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嚴重缺失，有負港人期望，未能夠交出滿意的成績表，有愧於社會。希望現屆政府向新一屆政府的交接過渡，於人事鋪排及政策延續兩方面都有章法，力求畫上完整句號。

老人問題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回歸以來，首屆特區政府已提出要檢討及解決老人問題。25 年轉眼過去，一代人之後的今天，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好好地照顧家中老人，是天倫，也是人子的天職。本人有不少朋友如今都已到「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年齡層，能不愧咎？

我們無意苛責特區政府領導，但是於老人問題的施政確實不足，雖未致一塌糊塗，總嫌社福、醫衛和財援部門之間長期積習難返，「各自為政碎片化，兵來將擋縫補補」。例如有關老人從來沒有統一定義，政策 60 歲有之，65 歲有之，70 歲有之。新冠疫情來襲，未能及時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學會使用智能手機 APP。派錢的安排也好，換發樂悠卡也好，沒有真正的跨部門協調，誰為便民和擾民

做分界？

安老對社會有重大好處

照顧好老年人，十分重要。以人為本的服務精神，在社會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怎樣營造讓老人體面地安心生活養老的生態環境，關係香港特區幸福感的提升，影響中生代留港發展還是移民他往的決定。怎樣完善老年健康的支撐體系，構建關愛老年人的社會，積極培育銀髮經濟，提升廣大長者群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這既是時代的需要，更是人民的呼聲，對於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質，提振年輕人對未來老年生活的信心，讓香港市民有方向感，願意安居樂業謀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政治意義。

從市場經濟角度看，養老產業或銀髮產業正在興盛。國內新時代的五化，即城鎮化、知識化、中產化、科技化和老齡化，各方面都商機無限，因為市場規模之大，全球獨一無二，極具吸引力，充滿想像力。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在這方面豈可錯過？從經濟角度有錢可賺（豈只是保健養老以及各類理財和保險產品而已），從社會角度和諧安定，從文化角度慈孝傳承。

發展適老產業 風物長宜放眼量

文章宜簡短，最後還有一點。老人院要重新考慮資源的均衡配置，發展適老產業，推動與老年人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藥品及用品行業規範性發展要求。在這方面日本和北歐領先，內地近年來發展迅速，有很多方面值得港人參考。

此外大灣區內應該考慮建立香港長者城，如今港珠澳大橋提供了一個最便捷的交通方法，珠海已為香港的長者養老產業作出有效鋪墊，就等恢復有序通關的一天到來。香港特區一定要融合到大灣區，要規範發展機構養老。政府應該通過直接建設，委託運營，鼓勵投資等多種方式，發展機構養老，在全港構建一刻鐘養老生活服務圈。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具前瞻性的安排。

香港特區過去一直以來最關鍵的問題，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貫短視，沒有長遠規劃。政府力量在這方面長期失職失責，沒有大視野和大格局，最終影響了老人的生活素質，辜負了香港作為全球最長壽地區之一的美名。生命如果沒有生活質素，試問長壽何用？生命如果沒有善終服務，長壽有何意義？

要想促進機構養老的規範發展，只靠市場之手和資本之力遠遠不夠。老齡化和小子化，正加速增加未來養老責任由中生代承受巨大壓力。特區政府未能夠未雨綢繆，對於養老規劃沒有明確的解決之道。面對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中生

代趁着如今移民的門檻甚低，萌生一走了之的念頭，遠赴他鄉謀發展。本人近日和一些中生代朋友談起克盡孝道的問題，細心聆聽之餘，感到痛心疾首。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整體環境改善中，風物長宜放眼量。

本文略加刪節，原刊於「點新聞」，獲作者授權轉載於《灼見名家— 品評四方》2022年06月13日

<https://www.master->

[insight.com/%E9%8A%80%E9%AB%AE%E7%94%A2%E6%A5%AD%E6%BD%9B%E8%97%8F%E5%B7%A8%E5%A4%A7%E7%99%BC%E5%B1%95%E7%A9%BA%E9%96%93/](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9%8A%80%E9%AB%AE%E7%94%A2%E6%A5%AD%E6%BD%9B%E8%97%8F%E5%B7%A8%E5%A4%A7%E7%99%BC%E5%B1%95%E7%A9%BA%E9%96%93/)